

文化古迹保护考验政府的责任意识

一南一北,涉及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古迹保护的课题,再度成为新闻。一个是在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部分拆除;另一个是在南京,老城根的拆迁在大规模推进。尽管两地的拆迁均被暂时叫停,而其未来命运如何,人们依然忧心忡忡。

时下,有两种不同的景象同时存在:一种是一些地方在绞尽脑汁借历史名人之势,打造旅游热点,甚至不惜让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下凡”人间,给其找个“出生地”,以拉动当地旅游业的兴旺。另一种,在一些文化古城,名人故居等文化古迹似乎并不招人待见,有时甚至显得“碍手碍脚”,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推平头式”的拆迁可以在几分钟内终结数千年数百年的古迹命运。

保护文化古迹,“没钱将拥挤的住户从

如果还是贫穷,如果眼睛还是只盯着一年两年的GDP,则显得过于急功近利,说不过去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应该有底气和实力更多地为人着想。当然,其前提是决策者能站在对历史负责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开发商的立场

古迹中搬出”,几乎是各地一致的“难处”。即使不打算从旧城改造中赚钱,一些地方政府也并不打算为此掏钱,于是,同时想到了开发商。

而在无利不起早的商人眼里,文化古迹上的建筑,“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五分钱”,即那只是一块“地皮”而已。而这“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青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

热衷于出国游的人都有体会,游客千里迢迢到异国他乡,想看的,不是那刚盖起三五年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而是那里数千年数百年前留下的遗迹,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叙

述。“每一座名人故居都和一位或几位历史伟人联系在一起,都有一大堆故事,这就是文化。那房子表面看似很破、很旧,但它是宝。掸去尘土,它会闪出耀眼的光。”舒乙先生在《名人与故居》一书中这样说。

然而,当分不清责任的时候,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一直是一对难解的矛盾。正如一位从事文物行政管理的官员所说:不同意拆除文物,就是不按领导的意思去做,得罪领导;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做,拆了文物,得罪了社会,昧了良心——要跳出这样的两难困局,不能指望开发商的“觉悟”,而要求城市管理者具备这样的理念及长远眼光,即保护文化古

迹是政府的责任,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不能推给别人。

今天,不少地方已经具备了不同以往的实力,拥有了相当的“家底”,不缺那一两个小钱了。如果还是贫穷,如果眼睛还是只盯着一年两年的GDP,则显得过于急功近利,说不过去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应该有底气和实力更多地为人着想。当然,其前提是决策者能站在对历史负责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开发商的立场。

在城市建设等领域,我们见惯了争分夺秒,“一年一个样儿,三年大变样儿”。对其隐患,往往视而不见。对于一旦决策就可能铸成

无法挽回局面的事,对于那些因为今天的草率而可能给后人留下极大遗憾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脚步放慢一些,让更多的理智声音参与社会治理,从而找到更稳妥的方式?

这话对于那些一心等着在三五年内出政绩的人,可能很不顺耳。所以,我们需要制度支撑。比如,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要与时俱进,保护方式应更加多元化等。更重要的是,对那些肯为历史负责的官员要有制度性的鼓励,即将文化古迹的保护纳入干部政绩考核范畴之中。

北京,被美国建筑学家称为“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这份荣光属于我们的先人。而能否使这份荣光延续下去,则是今人的责任。其它地方的古迹保护也是同理。我们有没有信心立下这样的誓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们的决策是对的。

近日,为了庆祝上半年的骄人业绩,不少开发商大摆庆功宴,奖金论袋于装,明星找最红的请——据7月15日《北京晨报》报道,这种建立在高房价基础上的狂欢,让不少购房者觉得不舒服。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房地产业逆势飘红,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3410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7%;商品房销售额15800亿元,同比增长53%。为此,开发商自然高兴得很。

一边是房产商大摆庆功宴,集体狂欢,另一边是无力购房者黯然神伤。一些房产商炫富的快乐是建立在房奴痛苦之上的,刺痛着公众的神经。

楼市回暖,房价上扬,这与此前国家出台的诸多房地产刺激政策有关。政府托楼市,是因为房地产业是带动性很强的龙头产业。但楼市回暖,房地产商不能趁火打劫,将政府的救市政策变为敛取暴利的筹码。

再者,政府的政策再好,房产商的营销策略再成功,最终落脚点还是购买商品房的百姓。因而,房产商自然要高呼共赢,实现共赢。但现在,一些房产商一边通过隐瞒楼盘成本、人为炒作抬升房价等途径,赚了个盆满钵满,一边却大摆庆功宴,这岂不是在“房奴”伤口上撒盐?

指望房产商主动调低房价,是太天真了。但有一点,在公众的口碑中,房产商们也指望自己会落下什么好的评价。要知道,市场经济,不想着赚钱的商人是不正常的,但眼里只有钱的商人也难赚得好的名声。

圈点新闻

坦言“丑闻”

据《楚天金报》报道,日前,武汉市市长阮成发痛斥“经适房六连号”事件弄虚作假,坦言这是“政府丑闻”,并誓言打造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

与某些人一遇到问题便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相比,这位市长勇于认错,勇气不小。俗话说:知耻而后勇。一愿市长说过去之后,更有具体行动的跟进;二愿类似的“丑闻”以后少些再少些。

“最牛”交警

7月13日上午10点,在铁路一位交警给一辆乱停车的警车贴罚条。这样认真的交警值得我们敬重!——据《城市信报》报道,这篇名为《青岛史上最牛的交警,难得!》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

这一帖子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人们没想到交警会对违法的同行说“不”。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称赞并非好事,相反,更应该引起更多交警的反思。

学生早熟

三成高中学生有特殊异性朋友,三成高中生有拥抱、接吻、抚摸等边缘性行为,而初中性行为的年龄竟然下探至12岁——据《广州日报》报道,这是一份名为《佛山市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报告》反映的问题。

过早的性行为会影响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会给社会增加负担,但面对90后性早熟的事实,说禁没有商量的教育方式行不通了。或许,教孩子们一些必要的避孕知识,告诉他们如何避免性病的传播,这样的疏导更现实。

新闻观察

禁酒令挡不住“陪酒醉死”

7月13日中午,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47岁的副局长张国发,在一家酒店陪客吃饭时,因饮酒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据7月15日《武汉晨报》报道,新洲区纪检监察局人士表示,区纪检监察局2005年就发布了“禁酒令”,今年的工作重点在查处公务接待。全国庆饮酒过量身亡一事是否涉及公款消费以及有哪些公务员参与饮酒等问题,区纪检部门已启动程序介入调查。

透过媒体记录获知,武汉市多次下发禁酒令。那么,为何多道“禁酒令牌”禁不住官员

的吃喝风,以致爆出官员醉死的丑闻呢?是官员太贪杯还是另有原因?

时下,一些官场酒文化盛行,迎来送往、检查评比、升职加薪、培训参观、乔迁庆典等,都成了公款吃喝的由头。当然,还包括不少假借公务接待之名行贪污之实的现象。在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贪污受贿才是犯罪,没有装入账包的公款吃喝不算腐败的潜规则。

工作日午餐饮酒的危害显而易见,备受百姓诟病。对此,有关领导人曾专门批示,要求多部门合作治理。事实上,好多地方也都颁布了禁酒令。据报道,河南信阳等地采用“禁酒令”治理公款吃喝,就取得了一定成效。笔

者也期待这些地方长期坚持禁酒令,成为官场酒文化转变的风向标,但不久前传来的信阳新县计生委主任应酬饮酒过度死亡被记三等功的消息,则击碎了我的期待与信任。

可见,在一些人眼里,禁令归禁令,喝酒归喝酒。要根治公款吃喝痼疾,关键要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加强财政预算约束。正如一位经济学界所言,“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吃喝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渊藪。落实禁酒令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约束硬起来。”

由于一些地方财政预算随意性较大,对

公务接待中的大吃大喝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监督与处罚措施乏力。如果没有喝出人命,没有闹出大动静,又有多少地方与禁酒令较真呢?因此,要堵住公款大吃大喝黑洞,不能仅指望一个禁酒令,更要抓住根本,比如,一要约束公权力,把公款吃喝腐败与官员乌纱帽挂钩;二要约束财政预算,扎紧公共钱袋子。

从长远来看,整治公款吃喝还应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公款吃喝。如果公权力受到了刚性制约,不用上级颁布什么禁酒令,官员出于违法的成本考虑,用公款大吃大喝时,自然会有所顾忌。

图说

训子



上海的一些年轻人虽身有一技之长,却存在适应能力不强、心理不成熟等问题,在找工作时屡屡碰壁——据《新闻晚报》报道,这大多与他们的家庭影响有关,即父母事事代办,不肯放手,并要求孩子找工作一定要坐办公室当白领。

“坐办公室”图的是轻松,可轻闲往往并不一定等于成功。

大众话题

“恋爱纳入诚信系统”无法操作

7月15日《重庆晨报》报道,西南大学日前在国内首次亮相古诗体《大学生诚信守则》和全新的大学生诚信网络考核系统,规定大学生在校恋爱“是否存在欺骗他人感情”的情况将作为是否诚信的评判因素之一。

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从大学开始,这是好事。但问题是,将大学生在校恋爱“是否存在欺骗他人感情”的情况作为是否诚信的评判因素之一,并纳入系统接受统一评分,则让人不敢苟同。关键在于,这实在不好判断和取证,无法操作。

空军雷达学院发出倡议

让军校成为培育核心价值观重要阵地

本报讯(记者杨连元 通讯员晋进科)空军雷达学院作为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全军典型,7月中旬在中央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之后,近日学院院长蓝江桥、政委黄宏通过全军政工网发出倡议,倡议军队院校应成为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在各项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中努力发挥先导、引领作用。

倡议中提出,军队院校应当遵循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动仗;应当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旨在培养热爱学员、诲人不倦的道德情感,塑造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的道德风范,以真理论和人格的力量影响启迪学员;应当坚持军队院校

时代先锋

生命在燃烧中璀璨

——记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工程师李朗红

新华社记者 王敏 樊曦

李朗红原在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公司任领导,2003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52岁的李朗红只身来到福建,凭借一张地图、一个水壶、一个望远镜,开始勘查、选择厂址及筹备项目工作。

经接洽,总投资105亿元的宁德火电列入省市重点项目。

初期,李朗红出去勘查地,每去一个备选地址,都要动用“联合交通工具”,乘车、乘船、再步行2个多小时。

综合论证后,项目在福安市湾坞乡龙珠村落地。李朗红和同伴住进小渔村,每天骑一辆自行车,戴一顶草帽,在海堤只有1米多宽的泥沱小道上往返1个多小时。修路、吹砂、炸山的施工工地上时常出现他忙碌的身影,村

民们时常见到这位“戴草帽的老总”,称他是干事业、做大事的人。

仅3年多时间,宁德火电厂一期工程两台60万千瓦机组相继投产。昔日杂草丛生的荒滩,崛起一座现代化的火电厂。

一座百万千瓦级火电厂仅用3年多时间就完成前期核准及工程建设;宁德核电创造了国内核电项目前期工作周期最短的纪录。在这些刷新中国电力建设纪录的“福建速度”背后,是李朗红的忘我奉献。

宁德核电项目前期,10天内就收集了海

洋、陆域、水文等所有资料,22天完成了厂址踏勘报告,3天完成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写,5天完成设计院要求的资料收集……这一件件令同行赞叹的业绩背后,是李朗红拼了命在与时间较劲。

李朗红的驾驶员史德鑫平均每天出车200多公里,最多一天跑了1400多公里,从宁德往返厦门两趟。

2008年7月3日,是李朗红在福建工作的最后一天。

他的日记里这样写着:上午,陪总公司领

人民英雄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导验收泉州培训中心;下午,到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检查,核磁共振结果不好,消化内科专家说必须马上手术;晚上,到办公室整理一份降低工程造价的资料,供公司参考。

李朗红连夜整理出来的29页资料,装订得整整齐齐,放在办公室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他精心保存了8年的中国最大火电厂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公司降低工程造价的文件资料。

李朗红逝世后,留下了两大箱100多本、几百万字的工作日记,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他弥留之际,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工作时,他嘱托妻子和儿子,把这些资料交给单位。他孜孜不倦的求学好学,始终如一的刻苦被人们称道,许多工作方法和宝贵经验,被同事们广泛学习和实践。

宁德核电公司副总经理陈映坚说:“李朗红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他的工作热情、拼搏精神,带动或影响着周围的干部员工。从他身上,干部员工看到了大唐的同心文化、成本意识和与市场接轨的前瞻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山东青州一中学招生竟靠抓阄

(上接第1版)

更有学生家长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生的范围、标准和方式。青州一中实验学校是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一所民办初中,以往都通过统一入学测试选拔学生,而今年为什么要青州教育部门的要求下,选择抓阄录取的方式呢?

针对家长的疑问,青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青州一中实验学校虽是一民办学校,但只要不是九年义务教育学校,不管是民办还是公办,根据《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行)》规定,都需在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下开展招生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一律实行划片招生,不举行或变相举行选拔性考试。因此,青州一中实验学校不能组织考生进行统一考试录取,由于当天学校报名人数众多,教育部门用抓阄的方式录取学生也是无奈之举,保障录取公平合理。

对此,业内法律人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该条例应比《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行)》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

恽代英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惊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恽代英就义前留下的豪迈诗篇。

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

北武昌。1915年,进入中华大学学习。这一年,陈独秀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恽代英受它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后来成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恽代英与林育南等人创办利群书社,成为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1920年春,恽代英到北京,与李达、邓中夏等建立了联系,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年秋,他翻译并发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不久,他受《新青年》杂志委托翻译并出版了考茨基的著作《阶级斗争》,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一批重要领导人都曾发生过深刻影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底,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4月,他到四川泸县,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对学校进行改革,聘请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教师任教。1923年初,他应吴玉章等人邀请,经重庆到成都,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任教,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夏,他应邓中夏之约,来到上海,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不久,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团中央执委会委员、宣传部部长,与邓中夏等一起创办和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半月刊。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呕心

沥血,精心编辑,亲自撰写并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几十篇通讯,使《中国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右派的重要阵地,成为青年们最喜爱的进步刊物,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

1923年,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恽代英坚决拥护党的这一政策,提出要在统一战线中注意“为无产阶级树根基”。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现了国共合作后,他与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担任宣传部秘书。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他参与领导“五卅”爱国运动。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在黄埔军校的工作,派他担任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任军校中共党团干事,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他和黄埔军校著名共产党员熊雄等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被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凶”之一。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5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当选中央委员,与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一起,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抵制

人民英雄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